

学校编码: 10384

学 号: 13920171150311

廈門大學

碩 士 学 位 论 文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以厦门市同安区顶村村为例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A Case Study of Ding Village of Tongan District
Xiamen

陈璐璐

指导教师姓名: 周茜 助理教授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论文提交日期: 2020年3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20年6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20年 月

2020年6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本人声明该学位论文不存在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并愿意承担因学术不端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声明人 (签名): 陈璐璐

指导教师(签名): 周志

2020年6月15日

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克服普遍存在于中国农村生产、生活以及生态情境中的“乡村病”,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是否存在更加高效的整体性研究工具,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并更加全面地理解影响乡村治理行为的关键因素?对于已经取得一定发展成就的典型案列,其经验又有何可借鉴之处?本文借助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这一研究工具,综合运用访谈法与观察法,对典型单案列进行研究。通过框架筛选出影响治理行为的核心变量,并对核心变量在生产、生活以及生态各种情境中及跨情境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描摹。进一步得出,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乡村系统中的基础设施与位置状态、各资源单位间的互动情况、村组织与合作社的运行状况、以及使用者系统中的使用者人数和技术运用等因素均会对乡村治理行为产生影响,“三生”情境间的互动状态也会随着治理行为的转变而转变。

关键词: 乡村治理;“三生”融合;社会-生态系统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How to overcome the common "rural disease" in China's rural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ical situ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re a more efficient holistic research tool that can help us identify and more fully understand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rural governance behavior?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ypical cases that have achieved som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With the help of the research tool of social ecosystem framework,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s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methods to study typical single cases. The core variables influencing governance behavior were screened out through the framework,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re variables in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ical single situation and cross situation was described. Fur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cosystem, factor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and location status in rural system, interaction among resource units, operation status of village organizations and cooperatives, number of users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user system, etc. will affect rural governance behavior, and the interaction status between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situations will also be affected by governance behaviors.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及目的	2
1.2.1 研究意义.....	2
1.2.2 研究目的.....	2
1.3 文献综述	3
1.3.1 国外乡村治理研究现状.....	3
1.3.2 国内乡村治理研究现状.....	6
1.3.3 文献研究述评.....	8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9
1.4.1 研究内容.....	9
1.4.2 研究方法.....	9
1.4.3 技术路线图.....	10
1.5 创新与不足	11
1.5.1 创新点.....	11
1.5.2 不足点.....	12
2 理论分析	13
2.1 框架工具	13
2.2 框架搭建	13
2.3 变量操作化	16
3 案例概况	21
3.1 资源系统 (Resource Systems)	21
3.1.1 基础设施 (RS4)	21
3.1.2 位置 (RS9)	23
3.2 资源单位 (Resource Units)	24
3.2.1 资源单位间的互动 (RU4)	24
3.3 治理系统 (Governance Systems)	25

3.3.1 村组织(GS1).....	25
3.3.2 合作社(GS2).....	25
3.4 使用者 (Users)	26
3.4.1 使用者数量(U1).....	26
3.4.2 技术运用(U9).....	27
4 情境分析.....	29
4.1 情境内互动分析.....	29
4.1.1 生产情境.....	29
4.1.2 生活情境.....	33
4.1.3 生态情境.....	36
4.2 跨情境互动分析.....	39
4.2.1 生态情境与生产情境互动.....	39
4.2.2 生产情境与生活情境互动.....	40
4.2.3 生活情境与生态情境互动.....	41
5 结论与展望.....	43
5.1 结论.....	43
5.2 展望.....	44
参考文献.....	45
致 谢.....	49

Contents

1 Introduction	1
1.1 Research background	1
1.2 Research significance and purpose	2
1.2.1 Research significance.....	2
1.2.2 Research purpose.....	2
1.3 Journals reviewed	3
1.3.1 Research status of rural governance in foreign countries.....	3
1.3.2 Research status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6
1.3.3 Review.....	8
1.4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s	9
1.4.1 Research contents.....	9
1.4.2 Research methods.....	9
1.4.3 Technology Roadmap.....	10
1.5 Innovation and deficiency	11
1.5.1 Innovation.....	11
1.5.2 Deficiency.....	12
2 Theoretical analysis	13
2.1 Theoretical basis	13
2.2 Frame construction	13
2.3 Variable manipulation	16
3 Case introduction	21
3.1 Resource Systems	21
3.1.1 Infrastructure (RS4)	21
3.1.2 Position (RS9)	23
3.2 Resource Units	24
3.2.1 Interaction of resource units (RU4)	24
3.3 Governance Systems	25

3.3.1 Village organizations (GS1).....	25
3.3.2 Cooperatives (GS2).....	25
3.4 Users.....	26
3.4.1 Numbers of users(U1).....	26
3.4.2 Technology application (U9).....	27
4 Situation analysis.....	29
4.1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within situation.....	29
4.1.1 Production situation.....	29
4.1.2 Life situation.....	33
4.1.3 Ecological situation.....	36
4.2 Cross situation interaction analysis.....	39
4.2.1 Interaction between ecology and production.....	39
4.2.2 Interaction between life and production.....	40
4.2.3 Interaction between ecology and life.....	41
5 Conclusion and Prospect.....	43
5.1 Conclusion.....	43
5.2 Prospect.....	44
Reference.....	45
Acknowledgement.....	49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速转型阶段,城市与乡村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发展差距均呈现扩大的趋势。中国长期以来“重城轻乡”的发展政策,造成了广大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整体落后的现状。^①人口、资源在城镇的高度聚集,造就了城市的繁荣也催生了乡村的衰落。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乡村地区深度贫困化等全面存在于生产、生活以及生态领域的“乡村病”日益严峻。

为应对这一局面,近年来党和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工作重心,遏制乡村进一步衰落。2016 年,国务院审批通过《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 年)》,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并提出了坚持生产、生活、生态协同推进的基本原则,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综合分析我国乡村产业基础、文化底蕴、生态资源等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生产、生活、生态同步协同发展的原则。2020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当前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这两大重点任务,提出进一步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以确保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和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将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协同推进原则运用在农村工作中,意味着妥善处理农业生产、农民增收与环境治理以及生态修复的关系。以满足农民增收为目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推动农业生产效率的现代化,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实践,推动农业强、农民富与农村美。

乡村治理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乡村范围内,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构成了一个彼此连携、相互作用的整体,同样也给乡村治理研究带来了诸多复杂与综合的命题。在乡村振兴和决胜全面小康的时代背景下,是否存在更加高效的整体性研究工具,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并相对全面地理解影响乡村治理行为的核心变量?对于已经取得一定治理成效的典型案例,其经验

^①王艳飞,刘彦随,严镇,等.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地理科学,2016,36(1):20-28.

或可为解决“乡村病”提供可行之道。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这一研究工具引入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并以“三生”为切入点，对影响乡村治理行为的核心变量，以及变量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

1.2 研究意义及目的

1.2.1 研究意义

从理论上讲，本研究意在以乡村系统整体作为资源系统进行观照，揭示驱动其内部生产、生活、生态各行动情境互动中的关键因素，探析其各情境间的耦合互动并归纳出有益经验，进而在理论上实现深化对乡村这一场域中生产、生活以及生态治理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是对将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运用于中国乡村治理这一具体情境中的适用性的探索与尝试，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公共资源治理理论有所裨益。

从现实上讲，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宏观与微观环境发生了变化，乡村治理也呈现出进一步多样化与复杂化的态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亟需在进一步深化乡村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探索适应新时代发展条件的理论指导。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运用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这一综合性整体分析框架，对影响乡村治理行为的核心变量进行识别，探析乡村治理历程中生产、生活、生态情境互相耦合的有益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当前农村发展势态的认识，识别出当下对农村地区普遍敞开的机会窗口的同时，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出差异化的乡村发展模式。对于进一步促成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2.2 研究目的

将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引入乡村治理领域，识别出影响乡村治理行为的核心变量，描摹出核心变量在生产、生活以及生态各单情境中及跨情境间的互动关系，是本文的研究核心。本文的研究目标如下：

目标一：将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运用于乡村治理研究中。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是适用于公共资源可持续治理的分析框架，而乡村因拥有连结自然环境与人类社

会的资源形态,属于较为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因此,本文选取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作为研究工具,在运用框架的同时对其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期实现为我所用,为讲好中国故事服务。

目标二:识别出影响乡村治理行为的核心变量。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引入主要为识别核心变量。作为因变量的乡村治理行为,受到存在于乡村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和使用者这四个子系统自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各核心变量的识别作为研究目的。

目标三:探索核心变量在生产、生活以及生态各单情境中及跨情境间的互动关系。乡村是一个同时具备生产、生活与生态等不同行动情境的综合性社会-生态系统。一方面,核心变量在单情境中的作用直接影响着该具体情境的治理成效;另一方面,“三生”情境之间也并非截然独立,同样存在彼此互动,共同影响着乡村系统整体治理成效。现有文献多从地理学角度对乡村作为“三生”综合体的空间承载有所研究,但从公共管理学视角切入,对不同行动情境之间的互动探索相对有限。因此,在识别出影响乡村治理行为的核心变量后,发掘各变量在单情境中对治理行为的影响,并描摹乡村系统中的跨情境互动,成为本文的研究目的。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外乡村治理研究现状

(1) 乡村生产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外学者认为乡村治理正在逐步转型,因此对农业生产的诠释已经不能再局限于比较单一的“农业”“农事”的内涵,抛出了“后生产主义”。这一理论认为,农村生产应该是一种对环境更友好的、不以高产量为前提的生产,农民可能会寻求土地、资源的非农使用以补充其收入的损失。农业的重点逐渐转变为对生态系统服务与文化景观保护等社会需要的满足。^①不过,欧洲的传统农业大国如荷兰、比利时、法国颇不以为然,认为“多功能”乡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兼顾“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两者间的平衡。^②

^①Wilson, G.A. 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 and Back Again? Exploring the (un)changed Natural and Mental Landscapes of European Agricultur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1, 26(1):77-102.

^②Van Huylenbroeck G, Durand G.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 New Paradigm for Europea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M]. UK: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3.

(2) 乡村生活

日本、韩国、美国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也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农村凋敝。激活乡村活力，提升乡村生活是各国不约而同的选择，主要体现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激活农村文化生活以及缓解人口老龄化这三个主要方面。

①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实现乡村振兴，日本推出各地因地制宜“造村运动”，通过持续的财政支付投入巨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经过20多年的“造村运动”，日本乡村与城市在生活生产基础设施方面实现了一体化。韩国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新村运动”的起始点也是从改善农村生活生产的基础设施开始，在1970-1980年的十年间，韩国累计投入2.8万亿韩元，相当于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农业进入大萧条阶段后，美国提出了“乡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1936年，“农村电气化法”出台，政府提供低息贷款，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农村地区的电气化程度，标着“乡村发展”的落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对农村诸如住房、社区公共服务、电力、通讯、水和废物处理等基础设施的贷款力度，美国农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②

②在农村文化生活方面，人口流出带来乡村传统文化衰微以及居民思想的消极与空虚。日本从1981年自三岛町开始掀起“生活工艺运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③韩国则从改变农村居民的思想意识入手，提出了“勤勉、自助、协同”口号，韩国学者韩道铉认为“一切为了发展的自助自立意识变革，是新村运动持续推进的原动力。”^④

③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方面，进入20世纪以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引起关注，1982年迄今，联合国已经召开了两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达成了老龄问题的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和马德里国际行动计划。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率先展开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①陈业宏,朱培源.从韩国“新村运动”解锁乡村振兴新思路[J].人民论坛,2020(02):72-73.

^②胡月,田志宏.如何实现乡村的振兴?——基于美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经验借鉴[J].中国农村经济,2019(03):128-144.

^③陈磊,曲文俏.解读日本的造村运动[J].当代亚太,2006(06):29-35.

^④[韩]韩道铉,田杨.韩国新村运动带动乡村振兴及经验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4):20-27+156.

日本最近几十年来先后颁布《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为老年人“老有所养”提供法律支持。同时通过“高龄雇佣”、“延迟退休”等措施让老年人“老有所为”。美国则是通过个人积蓄和投资收益、退休金以及社会保险收入几个渠道解决老年人的保障问题。作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则是发放基本养老金、住房补贴、政府提供医疗保障和社会服务保障来保障老年人的权益。^①

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流向城市造成乡村空心化现象,这并非中国独有,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出现过“空心村”等乡村衰弱景象。日本称之为农村人口的“过疏化”。^②针对乡村空心化,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振兴路径。日本有“造村运动”、韩国有“新村运动”、美国建设“都市化”村庄,都是旨在增加农民增收的渠道,提升农民福利水平,消除城乡发展差距,增强农村的吸引力。

(3) 乡村生态

西方主要国家专门针对乡村生态治理的研究比较鲜见,更多是对生态的整体关注。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教授等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疾呼,工业革命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给人类给地球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提出“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是应对这一困境的唯一选择。^③这是比较早的对日益严重恶化的生态发出的亟需治理的预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外学者提出了“生态村”建设的概念,并认为这是后工业化现象。按照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理工学院 Krister Wiberg 教授的解释,生态村的本质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即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平衡。^④对于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发,学者们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表达了看法。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A·科尔曼认为造成生态环境问题频频出现的不仅仅是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也是重要原因。因而他提出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决不能把人类政治生活排除在外,

^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国外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C]. 2011 城市国际化论坛——全球化进程中的大都市治理(案例集), 2011:104-105.

^②[日]今井幸彦. 日本的过疏地带[M]. 日本:岩波书店, 1968:26.

^③[美]丹尼斯·米都斯等. 增长的极限[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18.

^④Krister Wiberg. Ecological villages, a European reality[J]. Renewable Energy, 1998, 15(1).

必须要明确生态责任、动员公众参与。^①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政府以强制性税收形式向污染者征收补偿金,并以税金治理环境,还给受害者一个洁净的环境。^②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提速,现代工业对生态的负面影响加凸显:土地、空气、水资源、植被等均受到极大破坏,造成生态极度不平衡。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等一批学者提出“生态启蒙理论”,即人们不仅要有更高的保护环境意识,而且要始终持有对科学及其使用的领域与范围的警惕意识。^③这同时也触发了西方绿色思潮的兴起。以美国学者默迪、澳大利亚学者帕斯莫尔以及美国学者诺顿等为代表提出了生态治理理念: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开发更好的技术和实现技术创新;自然资源的市场化;更加推进现代化的超工业化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④

1.3.2 国内乡村治理研究现状

(1) 乡村生产

我国进入新世纪以后,在中央政府提出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加之城市消费需求外溢的背景下,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了对乡村治理转型的思考。张京祥等提出,在城乡关系谱系中,乡村应当扮演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的中国乡村治理的转型来实现“乡村复兴”的任务。^⑤这显然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相耦合。刘祖云等也持相似的看法,认为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传统乡村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村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乡村生产性功能的消解及其向非生产性功能的转化。提出中国后生产主义乡村功能可能有三种表现形式,即重新发现“农耕文化”的价值,重构“生活、生态与生产”兼具的乡村功能,以及发掘“乡村性”对于城市工业文明的意义。^⑥从现有文献看,对后生产主义的探讨是少量的初步的,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①[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

^②张星强 主编.广西国际税收研究会研究报告 2016[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25.

^③薛晓源,陈家刚.从生态启蒙到生态治理——当代西方生态理论对我们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04):14-21.

^④王雨辰.论西方绿色思潮的生态文明观[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3(04):17-26.

^⑤张京祥,申明锐,赵晨.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国际城市规划,2014,29(05):1-7.

^⑥刘祖云,刘传俊.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8(05):2-13.

(2) 乡村生活

关于农村居民的生活,学者也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角度予以关照。罗万纯从农户视角审视农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供给效果,认为由于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和环境保护知识缺乏、国家公共服务供给和农村居民需求的契合度不高、农村居民合作中存在“公共地悲剧”等原因,国家对农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的供给效果受到影响。^①韩磊等人基于2011-2017年中国农村发展指数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近几年中国农村消费水平和生活设施条件持续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但农业生产环境和农村生活面貌的改善程度相对较低。^②王磊则将农村中未婚中老年这一群体的生活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在健康、收入、消费、生活支持、日常交往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劣势,就此提出国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并改进执行效果,以改善农村中老年未婚男性的生活境况,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和谐与公共安全的潜在负面影响。^③左冬则同时关注到了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精神生活,认为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流出以及长期低生育率极大改变了农村家庭传统生活模式,虽经济支持增加,但传统文化衰落,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减少。^④农村生活方式绿色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生态宜居目标的关键,黄炎忠的研究认为推进农村生活方式绿色化转型的重心和难点仍然是绿色生活理念的培养。^⑤

(3) 乡村生态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增加了学界对乡村生态的关注的热度,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述对农村生态的关注。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便是生态宜居。早在新世纪初,中科院生态所的王如松提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从“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社会走向规模化、知识化、现代化的生态社会,为乡村居民提供方

^①罗万纯.中国农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供给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农户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4(11):65-72.

^②韩磊,王术坤,刘长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及地区比较——基于2011~2017年中国农村发展指数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9(07):2-20.

^③王磊.农村中老年未婚男性的生活境况与养老意愿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5(01):84-92+96.

^④左冬梅,李树茁.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J].公共管理学报,2011,8(02):93-100+127.

^⑤黄炎忠,罗小锋,余威震,唐林.农村居民绿色生活方式参与及影响因素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03):49-55.

便舒适的城市基础设施, 高效实惠的产业环境以及稳定和谐的社区氛围。^①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农村生态的研究聚焦于保护与开发。乡村旅游成为激励农户积极参与当地人居环境整治的新途径。^②同样存在不同的声音, 认为乡村旅游存在过于追求经济效益, 而忽视了给乡村旅游地及其周边区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负面效应, 提出要改变乡村旅游非生态化发展的现状。^③中国社科院韩磊等在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考察之后提出, 生态环境成为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制约因素。^④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加强立法来为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发利用保驾护航。^⑤岳花艳则提出应该从增强生态环境安全意识、转变农村发展方式、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推动科技创新等方面着手促进农村生态建设。^⑥

1.3.3 文献研究述评

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 乡村治理问题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可以看到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乡村治理的转型上已达成共识, 尤其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 国内学者综合观照乡村生产、生活以及生态不同情境对乡村治理成效进行考察已成为研究趋势, 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局限, 主要表现为: 相关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有限, 定量分析较多而质性研究不足。此外, 由于乡村系统的复杂性与综合性, 汇集了公共管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等等诸多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 但却长期缺乏能够将信息进行跨学科整合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导致已有研究成果难以融会贯通。

同时, 当前乡村治理研究虽呈现出综合性和整体性态势, 但仍表现出了以生产功能为研究重点的取向。而事实上, 乡村的发展在于结合自身的地域资源进行

^①王如松. 从农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期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方法[J]. 中国农村观察, 2000(01): 2-8+80.

^②闵师, 王晓兵, 侯玲玲, 黄季焜. 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基于西南山区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04): 94-110.

^③张香菊, 张康旭, 张红喜.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环境正义实现途径[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11): 297-302.

^④韩磊, 王术坤, 刘长全. 中国农村发展进程及地区比较——基于2011~2017年中国农村发展指数的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07): 2-20.

^⑤宋莎莎. 基于河南生态旅游现状调查分析的农村生态旅游法律保护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04): 223-227.

^⑥岳花艳. 河南省农村生态环境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06): 149-153.

深度挖掘，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实现与多元化需求的对接，也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要义。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文以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为依据，基于厦门市同安区顶村村的实践案例，识别出其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变量，探究不同情境中各变量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情境间如何互动最终提升乡村整体治理成效。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意义、目的；其次进行研究综述，通过对先前文献的研读，梳理了国内外对于乡村治理生产、生活以及生态方面的研究现状等内容，为本研究提供参考；最后介绍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提出创新点和不足点，有待后续深入研究；

第二章，理论分析。本章对本案例选取的研究工具进行介绍。以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作为本文开展研究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案例所选取的具体变量进行进一步操作化，构建起适用于本文具体情境的分析框架；

第三章，案例村庄的概况介绍。以前文筛选出的核心变量为依据，以核心变量为脉络对村庄概况进行描摹；

第四章，核心变量在单情境中以及跨情境间的互动分析。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分别对生产、生活以及生态单情境中核心变量的互动状态进行分析讨论，第二节将行动情境以生产与生活、生活与生态、生态与生产的方式两两相组合，对情境间的互动状态进行分析讨论；

第五章，对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相关结论，并对后续研究加以展望。

1.4.2 研究方法

(1) 访谈法

作者分别于2019年5月及2019年7月两次前往同安区展开走访调查，期间主要通过个体深度访谈的方式对研究相关信息进行收集。个体访谈主要以半结化的形式展开，调研期间共深度访谈15人：其中村民7人，村委4人，游客3人，以及政府相关管理人员2人。受访者身份兼顾景区从业者，民宿经营业主，农作物种植者以及游客等多种主体。政府管理人员座谈时长约2小时，参与部门主要

为汀溪镇小镇办以及汀溪小镇开发有限公司。对于访谈所获得的一手资料，后续还通过厦门经济特区统计年鉴、同安年鉴，以及新闻报道等进行互相佐证与查漏，直至信息饱和。

(2) 观察法

2019年7月3日至2019年7月8日作者对顶村村进行驻村观察，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持续观察、系统记录，来获得案例信息。通过深入和直接地对村庄中行动者的行为进行观察，记录下真实情境中的一手资料，进一步深化对案例村庄具体情境的认识和理解。

(3) 单案例研究

本文所选取的案例为厦门市同安区顶村村。2000年前后，顶村村还是一个负债累累的空心村。自2008年发展旅游业以来，顶村村于2014年先后被农业部授予“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以及福建省旅游局授予“福建省乡村旅游特色村”称号，于2015年入选国家旅游局公布的首批“国家级乡村旅游品牌”，入选“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并于2018年获得福建省委、省政府授予的“省级文明村”称号。从一个负债累累的贫困村到乡村振兴明星村，顶村村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系统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治理效能的提升，其发展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与借鉴。因此，本文选取顶村村作为典型单案例，通过整理半结构化访谈与实地观察所收集的资料，对案例乡村系统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入剖析，以期进一步深化对乡村治理规律的认识。

1.4.3 技术路线图

综合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本文技术路线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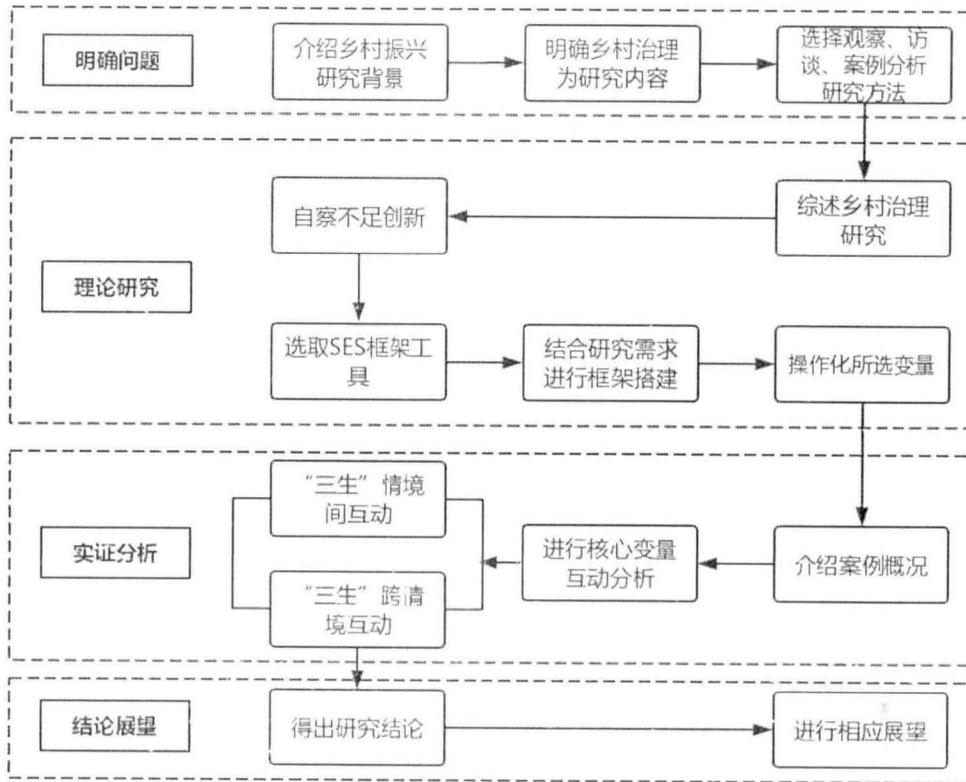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路线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1.5 创新与不足

1.5.1 创新点

(1) 关注乡村治理中“三生”情境间的互动。现有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多仅关注生产、生活与生态中的一种或几种情境，少有研究将之汇聚在同一框架中做综合分析；或虽关注多情境，但缺乏情境间的互动相融。本文尝试重叠乡村系统中的生产、生活与生态情境，综合分析其中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行动情境间的互相影响，以期对乡村治理实践与规律形成更加立体和全面的认识。

(2) 将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应用至新的研究领域。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作为资源可持续治理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尚未出现将这一框架运用于乡村治理语境中的研究。本文将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运用于乡村治理，是对该研究框架在乡村治理领域的适用性检验，为进一步提升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适用领域进行探索与尝试。

1.5.2 不足点

(1) 研究案例有限。受客观条件的制约, 本文选取同安区顶村村单案例作为分析对象。案例村庄从贫困村转变为乡村振兴“明星村”, 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治理成效, 属于较为典型的成功案例。但中国广大乡村资源禀赋千差万别, 存在相当多数量的村庄并不具备同案例村庄一般的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因此单案例研究的代表性有限, 其发展经验对于其他贫困村充分的借鉴意义相对薄弱。有待后期对案例村庄在数量上进行进一步挖掘与补充。

(2) 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以质性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 在核心变量的选取以及结果的呈现上较为繁琐且主观性较强, 后续研究将会补充进定量研究方法, 以期以更加简明方式将研究结果进行呈现。

2 理论分析

2.1 框架工具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Social-Ecological System）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提出的一个跨学科总体性分析工具，以期能够融合交叉学科中的多种知识，为不同学科构建起识别、诊断和分析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共同语言”。^①

由于人类社会对资源系统的开采利用，社会要素与自然要素被人为地连接在一起，组合成自然社会资源系统这一有机整体。而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意义，则在于将这一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分解为四个核心子系统以及一系列潜在的关键变量，帮助研究者在这一整合性框架中有效识别出影响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变量，并进一步理解社会-生态系统中各个变量间的关联，从而对治理行为进行诊断与完善。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由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和使用者四个核心子系统构成。受系统外部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以及生态系统的影响，在治理系统的约束下，使用者会围绕着开采使用资源和维护资源系统稳定展开一系列的行动，行动的结果会则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构成进行反馈，并对使用者下一步所采取的治理行动产生影响。利益主体之间治理行动的状况是造成不同治理结果的根本原因。

2.2 框架搭建

乡村作为一个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属于较为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因而适用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②本文将乡村整体作为资源系统进行观照，资源单位由山水田林湖草等自然资源单位以及生产生活等人造设施资源单位等构成，在村两委与合作社为代表的治理系统运作下，系统内部村民与外部游客等使用者共同对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系统中任何自变量的变化都会对作为因变量的治理成效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乡村系统的发展演化，任何时候都发生在由系统内部的资源单位、治理系

^①秦海波, 李莉莉. 国外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分析框架评介与比较研究[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8, 20(03): 160-171.

^②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04): 637-650.

统和使用者等子系统构成的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框架之内。而乡村作为相对基础一级的社会-生态系统，又处于更高级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中，受更高级系统的变化所影响。

下表为作者根据 SES 框架所整理出的四个核心子系统所包括的第二级变量列表。

表 2-1 根据 SES 框架整理的四核心子系统第二层级变量列表

资源系统 (RS)	资源单位 (RU)	治理系统 (GS)	使用者 (U)
RS1 村庄类型	RU1 资源单位的移动性	GS1 政府组织	U1 使用者数量
RS2 清晰的边界	RU2 资源单位的更新率	GS2 非政府组织	U2 使用者的社会经济属性
RS3 村庄的规模	RU3 资源单位间的互动	GS3 网络结构	U3 过往使用经历
RS4 基础设施	RU4 资源单位的数量	GS4 产权体系	U4 使用者的在村中的位置
RS5 村庄的产出	RU5 资源单位的显著标志	GS5 操作规则	U5 使用者的领导力
RS6 平衡性	RU6 资源单位的时空分布	GS6 集体选择规则	U6 使用者的社会资本
RS7 对村庄的预测		GS7 宪制规则	U7 使用者的社会-生态系统观念
RS8 资源状态		GS8 监督与制裁	U9 使用者对村中资源的依赖程度
RS9 位置			U8 使用者的技术运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基于“三生”视角，本文将乡村系统中的行动情境分别操作化为与生产活动、生活活动以及生态资源保护与开发活动有关的三大行动情境。其中，生产情境主要围绕生产活动展开，是乡村利用物质生产来满足乡村系统的内在需要的基本功

能。¹对这一情境的考察主要通过产业发展状况来具体实现。生活情境主要指乡村为村民生存居住所提供空间场域,使其得以进行各项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行动情境。²本文主要通过村庄人口承载、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以及精神生活程度等指标来对生活情境中的治理行为进行考察。生态情境,主要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的、维系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本文将主要通过使用者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资源开发行为对生态情境中的治理行为进行考察。

在此,本文尝试依据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搭建出对乡村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以及使用者系统对村庄发展过程中生产、生活以及生态情境的历时影响及跨情境互动机制具有更强解释力的分析工具,并在下文对照二级量表筛选出具体变量后展开进一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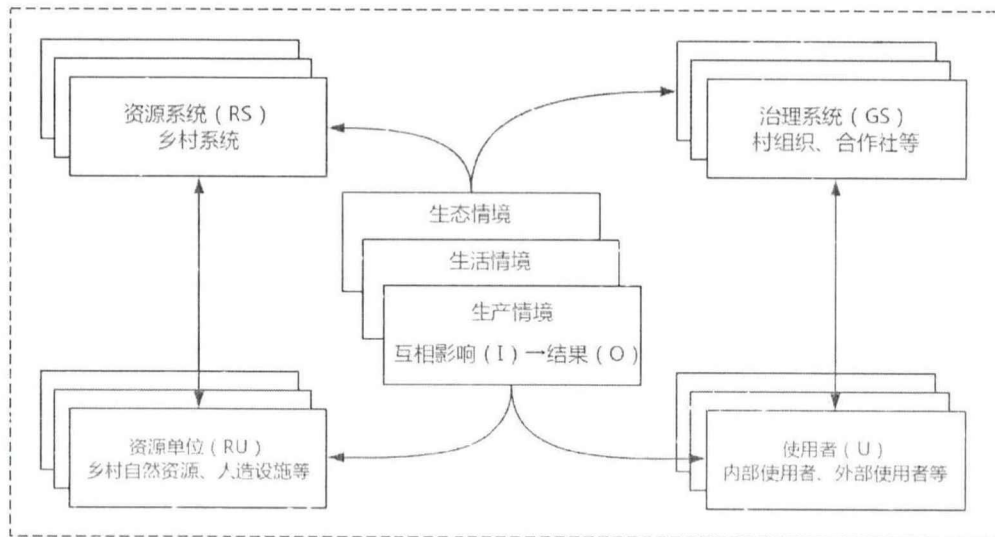


图 2-1 基于 SES 的乡村“三生”行动情境视角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¹王岱,喻吉萍,司其芳.主理权:具域特色的治理模式——以农村研究进展(二)治理科学进展(2013, 32(07):1113-1122.

²李伯宇,曹楠,吴银辉,刘伟,肖敏.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顶村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05):677-687.

2.3 变量操作化

参照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以及所选取案例的发展实践, 本文筛选出七个可用于解释乡村系统“三生”功能发展演化的二级变量, 分别为:

- (1) 资源系统 (RS): 基础设施 (RS4)、位置 (RS9);
- (2) 资源单位 (RS): 资源单位间的互动 (RU3);
- (3) 治理系统 (GS): 村组织 (GS1)、合作社 (GS2);
- (4) 使用者 (U): 使用人数 (U1)、技术运用 (U9)。

①基础设施 (RS4)

已有研究表明, 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①②}在农村基础设施领域资金投入的提升, 能够有效推动生产发展, 实现摆脱贫困。^③农村基础设施是产业兴旺的“先行资本”、是生态宜居的“必要条件”以及生活富裕的“重要保障”。^④对农村而言, 政府、农民和外部捐赠者都可能是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主体。^⑤在具体的操作化中, 学者们依据服务性质、投资主体等不同标准对基础设施进行了不同的分类。^⑥

本文基于“三生”视角, 参考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定义, 将农村基础设施划分为: 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三个主要类别。其中, 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主要指现代化农业基地及农田水利建设, 农业生活性基础设施主要指饮水安全、农村沼气、农村道路、农村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有益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建设, 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卫生、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等; 生态环境建设主要指天然林资源保护、防护林体

^①刘晓昀, 辛贤, 毛学峰. 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J]. 中国农村观察, 2003(01): 31-36+80.

^②谢申祥, 刘生龙, 李强.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05): 112-131.

^③樊胜根, 张林秀, 张晓波. 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在农村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中的作用[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01): 1-13.

^④曾福生, 蔡保忠. 农村基础设施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07): 88-95.

^⑤钱文荣, 应一逍.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11): 39-51.

^⑥邹蕴涵.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J]. 财经界(学术版), 2018(01): 3-5.

系、种苗工程建设,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湿地保护和建设、退耕还林农民吃饭、烧柴、增收等当前生计和长远发展问题。本文将主要从不同类别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对系统中的基础设施变量进行考察。

②位置 (RS9)

从地理位置上看,孤立偏远的农村地区更有可能陷入持久的贫困中。^①而乡村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位于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构成的广义地理环境中,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同时会对其区位条件产生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资金政策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能缓解由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贫困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缓解由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所带来的对减缓贫困的约束。^②因此,从本文将从研究对象所处地理位置(位于山地)以及社会位置(与城市相对距离较近)这两方面对系统中位置条件这一变量进行考察。

③资源单位间的互动 (RS3)

在乡村一级的社会-生态系统中,资源单位既包括“三生”情境中所涵盖的山水田林湖草等自然资源单位,同时也包括民居民宅、商业建筑、基础设施等人工设施单位。系统中资源单位间互相影响的程度一方面影响着资源系统的规模,另一方面反映着系统的资源利用状态。^③在当前的中国,存在大量具有优质资源但系统内部资源状态呈现出明显“小、散、乱”状态的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行动者既无能力也无想法对系统内部庞大、无序的资源进行组织和治理,导致系统资源利用效率低下。^④在本案例中,乡村旅游的发展帮助案例村庄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因此本文将通过村中各景点的串联程度对资源单位间的互动这一变量进行考察。

④村组织 (GS1)

在本文中,治理系统(GS)的两个核心变量村组织(GS1)以及合作社(GS2)均为根据案例村庄发展实践整合出的原创变量,是基于中国治理实践对原有研究

^①曲玮,涂勤,牛叔文,胡苗.自然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检验——自然地理条件对农村贫困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02):21-34.

^②曲玮,涂勤,牛叔文.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J].甘肃社会科学,2010(01):103-106.

^③王亚华.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理解中国古代的灌溉自主治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3(02):178-191+196.

^④杨慧莲,韩旭东,李艳,郑风田.“小、散、乱”的农村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基于贵州省六盘水市舍烹村案例[J].中国软科学,2018(11):148-162.

工具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一方面,组织是在一定环境中,为实现某种共同目标,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活动规律结合起来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实体。^①在乡村一级系统中,村组织往往主要以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织以及农村社会组织等形式存在。^②其中,村一级的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人员上存在大量交叉,二者所共同构成的具有政治、经济、社会“三合一”的综合性质的组织往往包办涵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治理有关的大小事务。^③本案例的调研中证实了这一点。在涉及村中公共事务治理的组织领导时,受访村民往往以“村两委”指代治理组织,几乎不区分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实践中的具体分工。因此,本文选择尊重当地形成的习惯,在第三章案例概况部分将对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组织架构等相关情况进行简单介绍,而在第四章情境分析部分均以“村两委”指代主导村中治理行为的村组织,不再对实践中的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群众自治组做具体区分。

另一方面,在为数不少的资源系统中,实现可持续治理的可能性会随着一些具有组织管理才能的行动者被尊为当地领导者而提升。^{④⑤}领导者的优秀品质(例如个人魅力以及威望)可以帮助其获得资源使用群体的信任,降低实现有效治理的交易成本,并且提升个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⑥在乡村一级系统中,富有领导力和权威的个体往往被称为“乡贤”或“能人”。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

^①[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基础[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②黄佳民,张照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角色[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04):188-195.

^③张晓山.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现状、问题与展望[J].求索,2016(07):4-11.

^④Wade R.,1994,Village Republics: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South India,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

^⑤Ostrom E,2009,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cience, Vol. 325, pp. 419-422.

^⑥Baland J M.& Platteau J P.,1999,The Ambiguous Impact of Inequality on Local Resource Manage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5, pp. 773-788.

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①而这些“乡贤”或“能人”往往成为村组织的中坚力量。

综上,本文将从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方面对村组织这一变量进行考察,并关注村中“能人”对于村组织治理行为的影响。

⑤合作社(GS2)

农民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具有多重功能:通过教化引导来提高农民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通过汇集农民意见成为农村公共事务协商决策的重要主体;通过投资投劳承担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通过调节农民之间、农民与其他各类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成为乡村社会重要的纠纷调处主体。^②乡村治理的本质是乡村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而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离不开相对明晰完整的规则制度。^③在此,本文同样从合作社的组织架构以及相关规则制度方面对合作社这一变量进行考察。

⑥使用人数(U1)

农村人力资源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同时也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农村人力资源在产业、行业、地区的资源状况,直接影响到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在显著提升农民的非农收入的同时,也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产生了不利影响。^{⑤⑥}已有研究表明,乡村治理的效果同时受到在村主要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在村时长的影响。^{⑦⑧}一方面,家庭主要劳动力在村时长越长,其参与村中公共

^①龚丽兰,郑永君.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J].中国农村观察,2019(06):59-76.

^②黄佳民,张照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角色[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04):188-195.

^③党国英.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现状与展望[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6(03):2-7.

^④董汉松,黄皎.新时代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分析——评《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耕地流转》[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08):208+225.

^⑤李谷成,李焯阳,周晓时.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孰因孰果?[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112-127.

^⑥高瑞,王亚华,陈春良.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02):84-92.

^⑦唐林,罗小锋,黄炎忠,余威震.劳动力流动抑制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吗?——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9(09):88-103.

^⑧Ruth S. Meinzen-Dick. Gender, property rights, and natural resources[J]. World

事务治理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另一方面,作为资源使用者的在村劳动力数目越多,其治理的潜在规模效益会相应提升,但也会随之提升相应的交易成本。本文将从不同类型使用者数量上的变化考察系统中的使用人数这一变量。

⑦技术运用(U9)

技术运用这一变量关注在行动情境中使用者利用资源的方式方法。在乡村治理语境中,技术运用往往意味着农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包括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全面实现各类农业信息及其相关知识的获取、处理、传播与合理利用,加速传统农业改造,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科学管理水平,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高效发展的过程。^①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农业技术的推广往往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生产率、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升。^②本文将通过是否存在技术运用以及具体在哪些情境中进行了运用这一变量进行考察。

Development, 1997, 25(8).

^①陈诗. 新媒体背景下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应用研究[J]. 农村经济, 2019(09): 110-115.

^②李博, 方永恒, 张小刚. 突破推广瓶颈与技术约束: 农业科技扶贫中贫困户的科技认知与减贫路径研究——基于全国12个省区的调查[J]. 农村经济, 2019(08): 42-50.

3 案例概况

顶村村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西北部，平均海拔约 400 米，面积 6.67 平方公里。截止 2018 年 12 月，村中共有农户 210 户，人口 674 人。村庄境内有耕地 620 亩，山地 9630 亩，森林覆盖率达 70% 以上。除丰富的自然资源外，顶村村还拥有山顶洋寨、乌石岩山寨等物质文化资源遗址，流传着乌石岩、出米岩等独具特色的民俗传说。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顶村村还是一个负债累累的贫困村。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顶村村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宜的发展道路，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以及系统内部生产、生态与生活情境的良性互动，实现了村庄治理整体效能的提升。

3.1 资源系统 (Resource Systems)

3.1.1 基础设施 (RS4)

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可获得性的提升对于减少贫困的发生有着正向的影响。^①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能够提升系统生产效率与村民的生活水平，进而有利于乡村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顶村村的基础设施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变化。

(1) 生活基础设施

根据前文定义，本文中农村生活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饮水安全、农村沼气、农村道路、农村电力、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卫生、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等。

2000 年前后的顶村村是一座位于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仅有一条贴崖过涧的简易山路与外界联通，村中干道及田间地头也均为未经修葺的泥土路。2005 年，顶村村筹措到 656 万资金用于通村道路修建。这条于 2006 年竣工的公路全长 9.3 公里，是同安区第一条“村村通”水泥公路。2007 年，厦门市成为全省首个行政村全面实现“移动信号村村通”的地市。得益于该项工程，顶村村也于当年完成了移动信号基站建设。

2008 年，顶村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获得厦门顶上人家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的“顶上人家”旅游项目投资。

^①谢申祥, 刘生龙, 李强.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05): 112-131.

2008年至2010年间，同安区政府与社会资金先后投入约12亿元用于建设区域内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项目的基础设施。顶村村通过“村村通”专项补贴基本完成了村内道路提升，实现了村中主干道的全面硬化。通过政府对老区山区改造的资金支持，顶村村先后投入约2100万元用于其中村中相关项目建设。其中进村公路建设850万元，村内设施改造460万元，饮用自来水投资160万元，机耕道路建设45万元，村村通公路建设300万元，路灯建设35万元。

2013年，顶村村入选农业部发布的“美丽乡村”建设试点以及厦门市“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建设试点，先后获财政补贴约800万元用于村中道路、安保工程、照明、文体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与修葺。得益于相关财政补贴，村中各支路得到进一步硬化；新安装了100多盏路灯，实现全村无黑暗角落；村内各交通要道也安装了电子眼，接入公安网络系统。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推动顶村村整体风貌在这一时期发生较为显著的改变。

（2）生产基础设施

根据前文定义，本文生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现代化农业基地及农田水利建设等。在本案例中，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体现为农田水利建设。

在发展初期，顶村村尚未建设规范的灌溉管道。2006年，顶村村先后投资80万元改进村中管道灌溉设备。2008年前后，“卫生人饮”工程以上级政府投资、顶村村民投工投劳的形式，获资330万元修筑了4500米的人饮、灌溉两用的管道，将山泉水引入每家每户。2010年又获农业灌溉用水改造190万元，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进行持续改进。

（3）生态环境建设

根据前文定义，本文生态环境建设主要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防护林体系、种苗工程建设，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湿地保护和建设、退耕还林等农民吃饭、烧柴、增收等当前生计和长远发展问题。在本案例中，基础设施变量语境中的生态环境建设主要体现为与林木资源有关的建设。

根据厦门市2018年度森林资源建档资料统计，顶村村全村土地总面积618.4公顷，其中林地面积532.4公顷，拥有76.6%的森林覆盖率和99.9%的重点公益林林木绿化率，森林保育成为顶村村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内容。2010年前后，顶村村委组织投资了120万元于村域面积内种植商品林500亩，每年为

村集体经济增收 30 多万元。2014 至 2018 年底，共建设生态风景林、景观林、休闲林达到 105 亩。村庄内居住区同样见缝插绿，林木覆盖率达 28% 以上。村域内公路、河道、干渠、空地等种植香樟、桂花、紫玉兰等树种，造林绿化率达到 98%。对村内 8 株古树全部进行挂牌保护，其中对 3 处 5 株古树进行建设古树小公园。重要区位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得到合理保育，森林建设形成以近自然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

3.1.2 位置 (RS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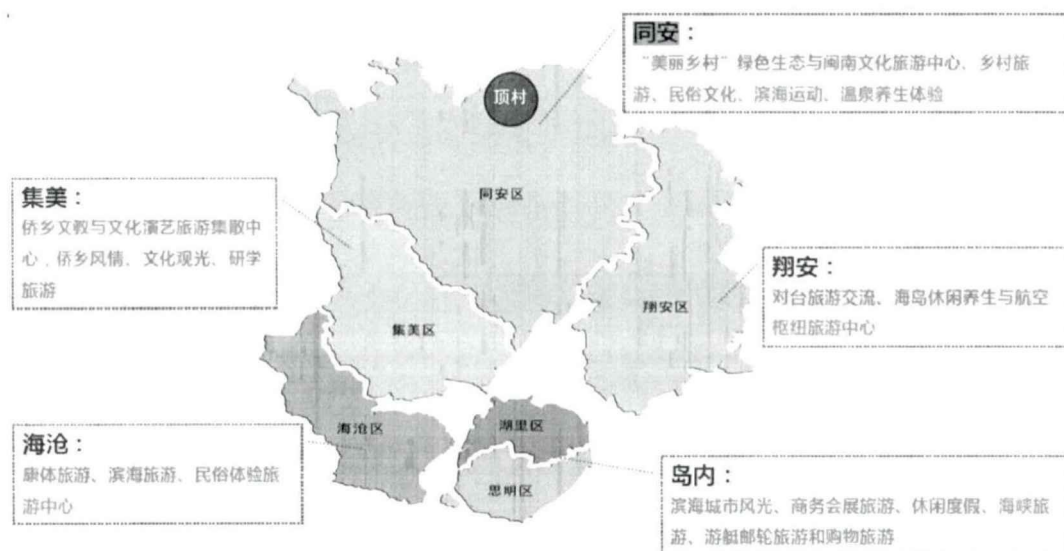


图 3-1 顶村村位置条件示意图

资料来源：厦门市同安区政府镇（村）建设规划。

就地理位置而言，顶村村位于同安区西北部山区，海拔高约 400 米。相对较高的海拔和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得顶村村成为典型的山区村，在限制着顶村村与外界交互的同时，也赋予其山林瀑布等平原村难以得见的自然景观。

就社会位置而言，顶村村位于厦门市北部，与泉州南安市、安溪县接壤，距同安区政府 15km，距厦门北站 23km，距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35km。坐落于闽南，拥有厦门、泉州等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沿海城镇作为经济腹地，便利的区位优势条件一方面在早期激励着村中劳动力背井离乡，同时也在以后为村中旅游业提供主要客源地。

3.2 资源单位 (Resource Units)

3.2.1 资源单位间的互动 (RU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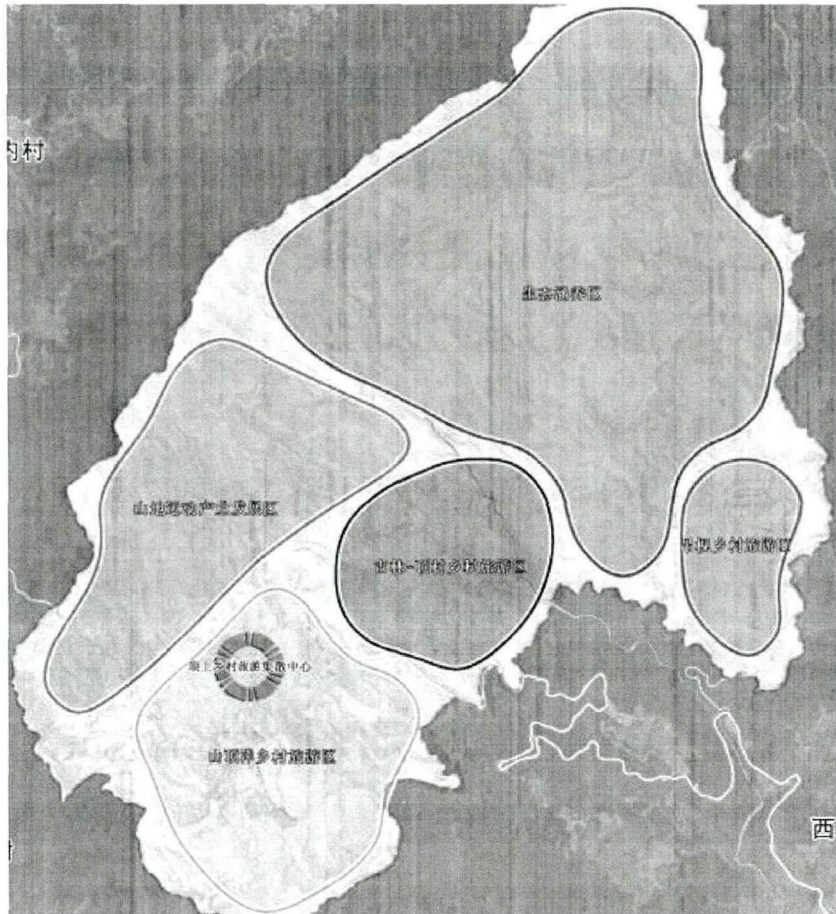


图 3-2 顶村村系统内部资源单位分布图

资料来源：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顶村村建设规划

在本案例中，资源单位数量这一变量主要体现为资源的有序集中串联。村中旅游业的发展催生出了“一心五片区”的空间布局。一心指顶村村乡村游客集散中心，五片区是指三片乡村旅游区、山地产业运动发展区和生态涵养区。

在顶村村发展之初，系统内部资源单位呈现出较为散乱无序的状态。在市场规则的指引下，乡村旅游的发展对村中资源系统提出了进一步挖掘自身潜力的要求。市场的驱动加之村庄根据不同片区功能与特点进行的科学设计与规划，系统内部原本松散或闲置的自然、社会资源实现了进一步的串联，开始产生实际效益。通过对系统中资源单位的整合使得资源状态由原先的零散杂乱转变为相对有序，

实现了数量和规模上的精简。

3.3 治理系统（Governance Systems）

3.3.1 村组织(GS1)

截至 2018 年底，顶村村党支部有成员 51 人，分为 4 个党小组，其中第一书记 1 人，村支部书记 1 人，村支部委员 2 人；顶村村委会有成员 19 人，包括两个层级，由村主任（1 人）、副主任（1 人）共同构成管理层，下辖社会保障委员会（1 人）、计划生育委员会（3 人）、人民调解委员会（3 人）、治安保卫委员会（3 人）、公共卫生委员会（3 人）以及各小组组长（4 人），并由 3 人构成的村务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

其中，马铭飘于 1997 年从厦门市退伍回乡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至 2016 年，对顶村村治理成效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村组织往往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等的形式，对正式制度的拟订进行商讨，并制定出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对生活活动及生态资源的利用行为规范，并推选出乡贤小组作为监督机构，以集体名义对违背公约的资源利用行为进行惩处。

3.3.2 合作社(GS2)

顶村村农家乐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5 年。截至 2018 年底，拥有社员 75 人，社员全部由顶村村民组成。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理事会、监事会，选出理事长、理事和监事。合作社对全村的旅游项目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

在运营、管理、监督架构当中，合作社通过建章立制、规范管理、整合营销、策划带动等综合方法，具体地负责顶村旅游开发的操作化事务，指导村民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有意愿经营民宿的村民到合作社报名登记，由合作社负责指导装修，并培训民宿经营技能；村两委对全村的乡村旅游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发管理，并对合作社提供政策支持，监管合作社运营；村民既可以以民宿入股参与分红，也可以投工投劳，成为合作社的员工。合作社成立理事会，由社员推荐、选举产生，管理服务人员负责营销、管理、接待、导览、财务结算以及村集体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等。合作社需要的保洁人员、服务人员优先从村民中选取，促进村民转产转业促增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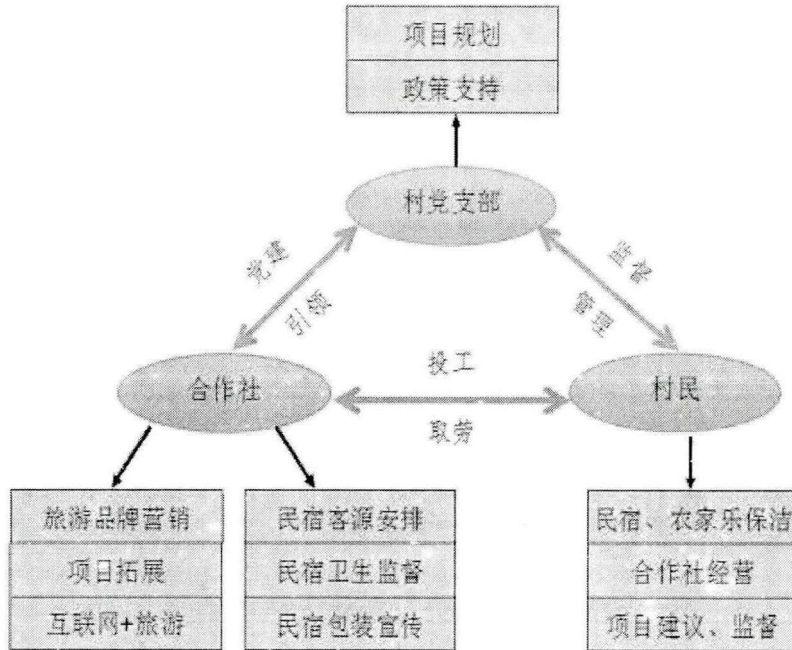


图 3-3 顶村村农家乐合作社管理架构图

资料来源：顶村村干部访谈提供

由农家乐合作社董事会主持，通过制定《顶村村农家乐专业合作社奖惩条例》等在内的相应规章制度，明确包括食堂、迎宾、保洁和安保等在内的各个岗位的职责，进一步规范系统内部成员在生产活动中的行为，促进治理绩效的提升。

3.4 使用者 (Users)

3.4.1 使用者数量(U1)

人是生产发展中最活跃的能动因素，无论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还是机械增长都为顶村村治理行为的转变和治理成效的提升提供了有生力量。在本案例中，资源使用者数量由少到多，其类型从以村民为主转变为以村民和游客为主。

2004 年时，顶村村户籍人口的 513 人当中，约四成以上的村民选择进城务工。在发展初期，顶村村成为了典型的空心村。旅游业发展以来，顶村村人口自然增长呈现上升趋势。

表 3-1 2014 年-2018 年顶村人口统计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人口 (人)	618	632	640	658	674

数据来源：汀溪镇派出所提供

从 2014 年起, 村中便陆续有 16 位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 以开设农家乐或在合作社从事管理或业务岗位的方式投入到顶村村产业的发展中, 截止 2018 年底, 这一数字达到了 50 余人。^①

表 3-2 顶村 2013-2015 游客数量增长统计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旅游人次 (人)	20000	30000	50000	80000	120000	160000

数据来源: 顶村村干部访谈提供

随着民宿产业的不断发展, 村中民宿数量由合作社成立之初的 130 间在 2018 年底增长至 239 间, 年接待游客数量也从 2013 年的 20000 人次增长至 2018 年的 160000 人次。

3.4.2 技术运用(U9)

在本文案例中, 存在技术手段的运用, 主要体现在生产情境中。具体而言使用者技术的运用大体上体现在耕作灌溉技术、烹饪技术以及现代网络技术等的应用等方面。

(1) 耕作灌溉技术

2004 年, 顶村村引进新品种反季节四季茭白, 使得村中茭白的产量从年收单季提升至年收三季。同时, 顶村村还先后投资 80 万元改进村中管道灌溉设备, 提升灌溉技术, 为 520 亩茭白供应泉水。

(2) 烹饪技术

旅游业发展以来, 顶村村开办了顶村食堂, 设计出以茭白为主要原材料的特色茭白宴。2018 年 12 月汀溪镇顶村-古坑片区乡村振兴工作组与同安区社区教育学校、同安区职业技术学校联合举办乡村合作社食堂和农家乐厨师茭白宴系列菜谱烹饪技能培训。

(3) 网络技术

^①20190704 马金军访谈记录

顶村村一方面依托网络平台,委托相关团队结合顶村特色设计出喜闻乐见的外宣形象,另一方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在微博、微信、投放图文资源,结合村中特色进行节事营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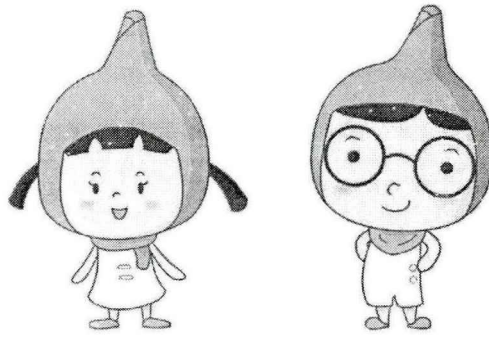


图 3-4 顶村村外宣吉祥物——茭白仙子

资料来源:顶村村干部访谈提供

4 情境分析

4.1 情境内互动分析

表 4-1 顶村村不同阶段各情境特征

	初级阶段 (2000年-2008年)	发展阶段 (2008年-2015年)	成熟阶段 (2015年至今)
生产 情境	以农业为主, 实现一定程度的现代化, 生产效率有所提升	旅游业出现和兴起,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以特色农业为核心的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成为主导产业
生活 情境	物质生活穷困, 精神生活匮乏, 人口流失显著	基础设施条件改善, 人均收入有所提升	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均有提升, 外出青壮年返乡现象出现
生态 情境	环境污染较为严重, 生态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 相对原始	环境污染行为得到遏制, 使用者在治理系统的引导下对环境进行被动保护	自然资源得到开发与利用, 使用者主动投入环境保护行动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4.1.1 生产情境

在以生产为主的行动情境中, 人们的行为围绕生产活动展开。在本案例中, 顶村村的生产活动基本实现了从粗放式到现代化的转变, 完成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以特色农业为基石的乡村旅游已成为村中的支柱性产业。

(1) 现代化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发展初期, 顶村村的生产活动主要体现为农业生产。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顶村村是传统农业村, 以茭白为主要经济作物。在发展初期, 顶村村种植传统单季茭白。由于缺乏基本的污水处理设备 (RS4) 和治污理念, 被污水灌溉的作物品质相对恶劣。不便的地理位置 (RS9) 限制了顶村村与外界的资源交换, 尚未修筑联同外界的道路 (RS4) 则同时提升着村民向外贩运农作物的成本, 村民

向外销售茭白往往需肩扛手提步行出大山。未经改良前的单季茭白一年只收获一季，总产量受到气候条件限制，且品质平庸且附加值低（U9），故难以通过抬高定价的方式对将茭白运往山下贩卖所耗费的人力、时间等成本进行回收，因而此时的顶村茭白在市场竞争中并无优势。2000年前后，顶村茭白价格仅在一斤两至三角左右，以茭白为主要农产品的顶村村民人均年收入约2200元。

随着“一村一品”等惠农政策的出台和推广，2004年时，在以马铭飘为代表的顶村村委（GS5）的推动下，村中实现了茭白品种和种植技术等改良（U9、RS4）。新品种反季节四季茭白引进使得顶村村在次年即实现了每亩1500公斤的增产，总体增产825吨，村中因茭白销售而较上年增收60余万元，全村新增产值115.5万。

从2008年开始，同安区财政每年拨款100万元建立“一村一品”奖励基金，采取以奖代补形式，专项用于扶持“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发展，顶村村先后投资80万元改进村中管道灌溉设备（RS4），提升灌溉技术（U9），为520亩茭白供应泉水。2008年底，人口规模570人的顶村村约95%以上的农户都种上了茭白，全村茭白种植共530亩，年产量2000吨。仅茭白一项农产品年收入便达400万元，加上芋头、地瓜、冬蜜、地瓜粉等其他特色农产品，年收入约达600万元。以茭白为代表的顶村村特色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和知名度都获得了显著提升。

（2）从“一”到“三”跨越式发展

随着社会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乡村旅游悄然兴起。2008年，顶村村委经过对自身资源禀赋的研判（GS1），决定顺应发展趋势，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村中能人马铭飘于2007年当选同安区人大代表（GS1），一方面在同安区人大会议上联合其他代表陆续提出《关于加大汀溪镇旅游产业、乡村旅游、农家乐项目扶持的建议》、《关于加大汀溪镇旅游基础设施投入的建议》等提案，进一步为顶村争得上层治理系统的资源倾斜（U9）；一方面发动自身社会资本引入外来投资，成功促成厦门顶上人家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顶村村的“顶上人家”旅游项目投资开发，破解乡村旅游发展之初资金技术不足的问题。外部企业资金和财政补贴的投入持续建设与完善着旅游基础设施（RS4），降低了游客来此的交易成本，提升了游客承载能力与游览体验。

外来企业投资项目的获利对村民的生产发展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带动村民的资源利用方式悄然转变（U1）。有了“顶上人家”提供的发展经验以及

客流基础,经过村两委的动员引导(GS1),村民马铭益和蔡秀琴等人开始于2013年试水农家乐和民宿,成为村里最早经营民宿的村民。在同村先行者的带动和利益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顶村村民自发地开办起了民宿(U1)。

而由于缺乏引导,自发从事民宿经营的村民未能得到规范有效的从业培训,室内装潢没有统一标准,服务质量也参差不齐(RS3)。同样,由于每家民宿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经营的村民不得不分享有限的客流量,引发了客源争抢和恶性竞争(U1)。这种混乱状态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对顶村村乡村旅游这一整体的美誉度产生了一定的损害。

为破解这一乱象,2015年9月,顶村村农家乐专业合作社(GS2)成立,确立了以村两委、合作社和村民为核心的乡村旅游管理模式。全村所有民宿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村民自愿提供装修好,符合接待标准的房间,全部由合作社轮流安排游客入住,住宿费由合作社统一收取,每月在业务微信群公开住宿情况并结存收入,合作社每间住房抽取30元管理费,剩余收入及时返还给社员,水电、床单换洗、卫生保洁等由合作社统一安排管理。在其他投资项目方面,顶村村休闲旅游点规模较大(RU3),收费项目较多,除民宿农家乐外,还有农耕体验、钓鱼、泡茶、大中型会议室和音乐广场等游览项目,其费用收入及经营管理统一归合作社(GS1)。除了股份分红的结余,其余收入基本都投入到村里的旅游项目建设和乡村提升之中。

民宿发展中,顶村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定位仍为面向城市游客的周末短途游,因此客流量较为显著地受到工休时序的影响。周末人声鼎沸,工作日门可罗雀。为解决游客资源时间分布不均造成的资源闲置与浪费(RS3),合作社通过与厦门市旅游服务中心沟通协调(GS2),合作创办了“海峡乡村旅游建设与培训示范基地”,并指导村中返乡创业青年创建“顶上乡村户外拓展基地”(U1),与周边企业开展长期固定合作,为其对员工进行素质拓展提供场地与设备。确保了无论工休村中都能有较稳定的客流(U1)。

(3) 旅游业成为村中支柱产业

顶村村对产业发展的持续投入得到了外部系统的肯定。2014年,顶村村获得中国农业部授予“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以及福建省旅游局授予的“福建省乡村旅游特色村”称号;2015年,顶村村入选国家旅游局公布首批“国家级乡村旅游品牌”,入选“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并于2018年获得福建省委、省政府授

予的“省级文明村”称号。伴随着技术手段带来的服务品质与景区知名度的提升（U9），以及村中各类旅游资源串联规划的不断完善（RU3），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村中（U1），一方面村中消费农事活动与农业景观，将资源变现；一方面拓展了以茭白为主的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农业生产效率也随之实现了较为明显的提升。

表 4-2 2015-2018 年顶村旅游收入概况

年份 (年)	数量 (间)	民宿出租收 入(万元/年)	年旅游人数 (人次/年)	年旅游收入 (万元/年)	村民人均收 入(万元/年)	村财收入 (万元)
2015	130	140	50000	300	2.3	35.8
2016	230	240	80000	500	2.9	80.2
2017	236	320	120000	1100	3.8	125
2018	239	340	160000	1500	-	150

数据来源：顶村村干部访谈提供

在农业和旅游业的双重驱动下，合作社这一新型治理组织的出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顶村村生产力。2015-2018 年底，顶村村民宿数量由 130 间增长至 239 间，民宿出租收入由成立之初的 140 万元增长至 340 万元，取代农业收入成为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小结：本文选取村中是否存在支柱型特色产业；产业品牌的影响力是否越来越大；第三产业经济贡献度是否越来越大作为衡量生产治理有效与否的指标。^①则在顶村村生产行动情境中，在村两委的运作下（GS1），以实现技术改良的茭白为代表的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以逐渐成为村中的支柱型产业（U9）；在治理系统的规划下（GS1、GS2），各类资源单位的合理规划串联提升了景区吸引力（RU3），助力顶村村将“美丽乡村”等荣誉称号收入囊中，从侧面佐证了村中产业品牌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旅游业已代替农业成为村民收入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应当认为顶村村的生产发展实现了较为有效的治理。

^①张挺, 徐艳梅, 李河新. 乡村建设成效评价和指标内在影响机理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11):37-46.

4.1.2 生活情境

在以生活为主的行动情境中,各关键变量对村民生活的影响的同时体现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人口承载中。在本案例中,通过各核心变量在生活情景中的互动,村庄生活基本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由匮乏到丰裕的转变,空心化和老龄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1) 物质生活水平改善

对于物质生活而言,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上。在发展初期,由于尚未接入自来水管网,地表径流、生活污水以及养殖业污水均汇入村民取水用沟渠(RU3),危及村民用水安全。同样由于缺乏统一的垃圾处理设备,焚烧和填埋是顶村村民处理生活垃圾的主要手段,村中公共区域也尚无专人负责保洁。

在村两委的积极争取下(GS1),随着财政补贴和外来资金技术的不断注入,村中的生活基础设施也随之不断完善(RS3)。截止2018年底,顶村村在给水、排水、电力通讯、道路和房屋改造等方面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①给水:当前顶村村的主要供水形式是接取山泉水,村民各设用水支管连接。

②排水:当前主要以散放排水和雨污合流制相结合的方式排水,目前除山顶洋自然村已建设污水管网系统,其他自然村尚未建设污水管网系统。

③电力通讯:村内电力通讯设施已较完善,但存在电线杆架设且交叉现象。

④道路:村庄内部除少部分支路仍未硬化外,大部分主道干道均已实现硬化,避免了以往雨天行路的泥泞。

⑤房屋改造:顶村村山顶洋小组已完成农房整治共有平改坡和裸房整治42栋,仅平改坡14栋,仅裸房13栋,既平改坡又裸房整治15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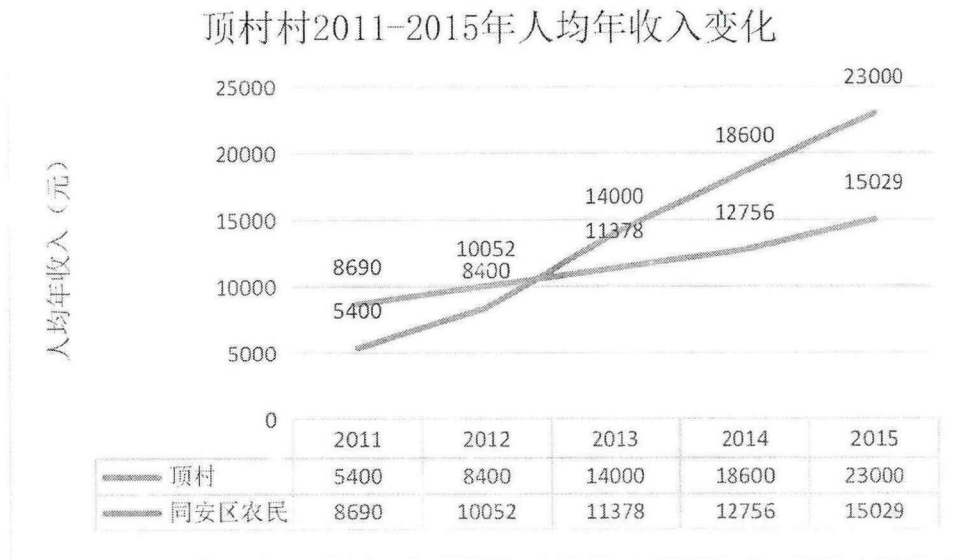


图 4-1 顶村村 2011-2015 年人均年收入变化图

资料来源：厦门市统计年鉴（2011 年-2015 年），顶村村干部访谈提供

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伴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给顶村村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明显提升。顶村村人均收入由 2000 年的 2200 元，提升至 2011 年的 5400 元，至 2015 年的 23000 元，从负债状态、低于区平均水平提升至高于区平均水平。

（2）人口承载能力提升

在发展初期，落后的基础设施无法为村民提供充足高效的公共服务（RS4），在限制顶村系统的人口承载能力的同时，还对系统内资源使用者产生推力。生活需求无法被满足的村中青壮年劳动力难堪清苦，纷纷背井离乡前往附近城镇谋求发展（RS9、U1）。2004 年时，顶村村户籍人口的 513 人当中，约四成以上的村民选择进城务工。这一时期的顶村村成为了典型的空心村。

农家乐合作社成立之初，马铭飘召集动员村外出青年回乡创业，并承诺给予其较好的发展待遇（GS1）。合作社以职工自愿入股的方式，为员工提供丰厚的薪酬、安定的生活保障，以切实利益吸引人才。通过建立宽松的工作环境，创造融洽的工作气氛，利用村民的故乡情怀，吸引在外有为青年“燕雀归巢”作为合作社骨干，做到感情留住人才（GS2）。在较低的生活成本、熟悉的生活环境以及向好的发展势头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青年选择返乡创业（U1）。

“我以前是在厦门的。2000 年去的。是在东渡那边开车的。（民宿）要开业了，这边缺人。赚的钱比较实在。一块就是一块。在外面，你赚十块，你还要租

房子，七七八八，到年底，剩下的钱其实没多少。像我们这年纪，在这差不多三千块，吃食堂的。以前连房子都没有。没有什么事，基本上不回来。”^①

人口自然增长与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一方面对于老龄化与空心化有所缓解（U1），另一方面，这些返乡创业的青壮年普遍具备一定的教育水平并接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具有较为开放的理念与创新的思维（U9）。

2014年，马金军退伍，回到顶村村参与组建农家乐专业合作社。在缺乏资金的前提下，马金军并不愿放弃自家发展民宿的机会，其妻黄礼琼一边向亲友筹款，一边寻找机会。同年，顶村村成为由厦门市同安区妇联和厦门农商银行联合授予的首个“巾帼创业示范村”，厦门市妇联的小额贴息贷款为顶村的创业妇女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希望帮助创业之初的农户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黄礼琼抓住机会积极申请，并动员身边村民共同参与，成为了顶村村11户获得妇女创业贴息贷款中的一员。

在顶村村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中，以马金军家庭为代表的返乡青壮年有能力在产业相关领域捕捉机会，并付诸实践，积极辐射带动身边村民。^②

（3）精神生活得到丰富

对于精神生活而言，在发展初期，落后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样也引发了村民精神生活的匮乏和生活观念的闭塞（RS4）。这一时期村中除一座1995年由市科委捐资兴建的希望小学外，并无其他科教文机构。1997年自厦门岛内回村任职的顶村村民马铭飘坦言，此时村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和他十余年前离家时“没什么两样”。

随着带着工业文明的城市游客大量涌入（U1），村民集中、连续地接受来自都市生活场景下的游客影响，与外界交流和沟通迅速加强，村民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迅速向都市生活转变。除了被动地接受外界文化的影响，顶村村也积极主动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迎合旅游业的发展。这种适应一方面表现在对篝火晚会、山地车爬坡挑战赛等常规文娱形式进行学习模仿，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对自身原本拥有的特色农业资源进行开发（RU3），举办富有自身特色的各种节事活动。2015年9月，“乡约·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暨顶村村“茭白文化节”活动由同安区汀

^①20190705 村民马访谈记录

^②王洁琼, 孙泽厚. 新型农业创业人才三维资本、创业环境与创业企业绩效[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02): 81-94.

溪镇党委、汀溪镇人民政府主办，顶村村委会承办（GS1），通过富有特色的茭白宴和茭白雕刻（U9）等活动形式吸引了诸多来自城里的游客。同年11月，一场主题为“传播农耕文化，寻觅顶村乡味”的农耕文化体验活动在顶村村举行（RU3），以“顶村村党支部书记马铭飘等您来PK犁田”为宣传口号（GS1、RU3），以千斤地瓜百斤茭白特色农产品为获胜奖励，吸引诸多市民前来参与。这些由村民组织游客参与的文化活动，在服务游客、丰富顶村村乡村旅游的内涵的同时，客观上也带动村民参与其中，充实着村民的精神生活。

小结：本文对生活情境主要关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人口承载，相应地选取了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程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精神生活丰富程度以及人口承载状况等作为实现乡村生活治理有效性衡量指标。^①在顶村村的生活行动情境中，在村两委的积极争取下（GS1），基础设施（RS3）随着不断建设与完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村中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先前有所提升（U1）；而大量游客的涌入激活了村民的精神生活（U1），同时也避免了传统文化的衰落。因此，应当认为顶村村在生活领域实现了较为有效的治理。

4.1.3 生态情境

在生态情境中，各核心变量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各种影响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活动。顶村村通过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和发展乡村旅游，较好地实现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生态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

（1）生态环境得到保护

顶村村在生态环境保护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水污染问题。汀溪水库群作为同安、翔安两区的重要饮水保障，其水源主要来自上游的溪（河）水和自然而降的雨水，而顶村村位于汀溪水库汇水范围内（RS9）。在发展初期，村民仍保有生猪养殖传统，而一头猪日均产生的污染物可以达到人的五倍以上。由于尚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RS4），村中的生活污水与养殖污水时常流入水库，对水库的水质安全产生了较大的威胁（RU3）。

^①申云,李京蓉.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角[J].调研世界,2020(01):42-50.



图 4-2 顶村村与汀溪水库群的相对位置

资料来源：厦门市同安区顶村村建设规划图

2012年，随着生态补偿制度的逐步落实，顶村村开始推动生猪禁养，村两委带头卖掉生猪、拆掉猪圈（GS1）。在村两委的示范和宣传下，村民积极配合，提前3个月完成禁养任务。在顶村村系统内部，水质污染问题在根源上得到了遏制。

2013年，受“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活动影响，在村两委的动员下（GS1），顶村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得益于这一工程，顶村村开展了厕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截至2018年底，在村中既定的三座厕所建设改造工程中，已完成一座AA级旅游厕所的改造，一座改造厕所正在设计，一座新建厕已选址完毕；顶村村山顶洋小组已建设污水管网系统，每家每户都安装了三格化粪池，并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实现了雨污分流，其他自然村水管网系统正在建设，大部分管网已经建设完毕。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量游客的涌入（U1），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环境承载力造成不小的压力。为应对压力，顶村村加入同安区“一把扫把扫到底”环境整治工程（GS5），雇佣村民作为保洁员对村中公共区域进行保洁，建成投用新的清洁楼（RS4），使顶村村得以接入同安区环卫工作网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2）自然资源得到开发

在顶村村发展初期,村中虽保有万亩山林等自然景观与千亩茭白等特色农业景观,但尚未进行有效开发。乡村景观的地域性特征是与高度同质化与格式化的城市工业文明相对比而言的。对于土生土长的村民而言,山水林田湖草是日日得见的寻常风貌,并无所谓独特性,也无经济价值可言。发展初期资源系统的相对封闭造成了顶村资源使用者结构的相对单一,能够识别、认可和购买顶村农耕景观与农耕文化的使用者尚未出现,因而未能对生产以及生活产生过多增益。而城市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完善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RS4),为外来游客得以识别、认可和购买顶村农耕景观与农耕文化创造力条件(U1),使得原本不具备经济价值的农业景观等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自2008年走上旅游发展道路以来,在治理系统的推动下(GS1、GS2),顶村村一方面对农田进行修葺美化,开发出茭白湿地公园、农业观光园区等将特色农业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的观光项目,还设计出茭白采摘、泥鳅捕捉等一系列依托本村生态资源的农事体验项目(RU3);同时,对村中农业作物以及森林等自然资源进行景观化处理:一方面,顶村依托北侧山体与主要干道,设计了结合现状山路和地形规划山体环形慢行线路,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的观览体验,同时也实现了森林资源的景观化开发;另一方面,采取挂牌的形式对村中古树进行保护,并对其中5株结合边角地利用,以“古树小公园”的形式进行管护与开发,引导游客前往休憩赏玩,进一步实现生态资源的旅游功能转化。充分满足游客对于乡村旅游亲土习性和心理结构、心理认同与回归诉求、乡村审美与田园精神方面的期待。^①

小结:对于乡村系统里生态行动情境中的治理行为,本文主要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资源开发,并相应地选取村庄水质状况是否良好,绿化率是否大于40%,生态资源无害化利用程度高低等对生态治理成效进行考察。^②在顶村村的生态行动情境中,在村两委(GS1)的推动下,生态补偿政策得以落实,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得以建成投用(RS4),村域内水污染得到较为有效的遏制,水质得到改善。在治理系统的统筹规划下(GS1、GS2),村中以农业作物与森林资源为

^①陶玉霞. 中国当代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及其表达的异化[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5(6): 54-59.

^②张挺, 李闯榕, 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 34(08): 99-105.

代表的各类生态资源被合理保护与开发(RS3),保持着全村 76.6%的森林覆盖率。因此,可以认为顶村村在生态环境方面实现了较为有效的治理。

4.2 跨情境互动分析

在案例村庄的治理实践中,生产、生活与生态情境并非彼此截然独立的关系,而是呈现出互相叠加渗透,融合共进的态势。

4.2.1 生态情境与生产情境互动

在本案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促进了生产发展,无论是农业发展还是旅游业发展,均建立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的基础之上。生态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生态环境保护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与场地,以及自然资源开发为产业发展提供卖点与基石这两个主要方面。

(1) 生态环境保护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与场地

生态环境的治理将系统内原本散乱劣质的资源单位进行整合,为旅游业发展奠定基础。以生态补偿制度的落实为例:2011年,厦门市政府投入1300多万元,对包括顶村村在内的5个行政村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采用PE整体三化池+海蛎壳生化脱磷渗滤等工艺建起52个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村庄生活污水。得益于这一政策,顶村村建成投用了三座生活污水处理池。在2012年10月竣工投用后,实现了约75%的生活污水处理率。同年,顶村村开始落实厦门市以生猪退养为主要对象的生态补偿制度。以生猪为例,被补偿对象可享受1500元/头/年的补贴(具体金额随当年经济发展水平变动,2019年已涨价至2880元),共补偿20年。同时开始进行发放的还有公益林生态补偿款,约500元/人/年(2019年数据)。得到生态补偿款的村民将拆掉的牲畜围栏改造成四合院,后者成为后期发展民宿的空间载体。

(2) 自然资源开发为产业发展提供卖点与基石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在促进了现代生产的发展也对人性产生了异化。同时,全球化文化冲突加剧了民族社会身份认同危机,而人的亲土习性和心理结构、心理认同与回归诉求、乡村审美与田园精神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城市游客希望通过乡村旅游体验来探新求异和缓解不安。^①在此

^①陶玉霞.中国当代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及其表达的异化[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6):54-59.

背景下,作为区别于城市的农村系统,顶村村特有的农业景观、农业文化等在愈演愈烈的城市化浪潮中获得了新的价值与内涵。农业景观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些景观反映了当地居民长期生产生活下形成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土地利用方式,生产价值、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和谐统一。农业景观的审美价值是其发展农业旅游、乡村旅游的基础。^①作为顶村村的支柱型产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具备将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纳入生产活动的特征。^②在此基础上,村中治理系统一方面立足村中生态资源禀赋进行合理规划,设计和打造出既不破坏生态资源,又能充分串联原本分散的景观资源,满足游客亲近自然需求的旅游线路和游览项目,实现了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

在生态治理有效的前提下,以农业景观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作为城市文明的异质性因素,吸引了大量城镇游客前来消费,刺激了旅游业的发展。顶村村生产情境中的行为从原本以农作物耕种与收获为主的第一产业生产行为转变为集农作物耕收与旅游服务为一体的综合生产行为。以特色农业为基石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村中的支柱型产业。

4.2.2 生产情境与生活情境互动

在本案例中,生产发展促进着村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以特色农业为基石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善了顶村村村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生产对生活的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旅居一体化推动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带动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改变村民精神面貌这三个主要方面。

(1) 旅居一体化推进生活基础设施完善

顶村村乡村旅游的旅居一体化特征决定了游客旅游体验空间与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空间的统一性。因此,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的需求也敦促着顶村村持续完善生活基础设施,提升村容村貌。通过对上文的梳理,在生活基础设施持续改善的过程中,顶村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也完成了由最初的政府投资转向企业投资再到自投资的转变,实现了从外部驱动到自我驱动的转型。

(2) 产业发展带动人均收入水平提升

^①何露,闵庆文,张丹.农业多功能性多维评价模型及其应用研究——以浙江省青田县为例[J].资源科学,2010,32(06):1057-1064.

^②范水生,朱朝枝.休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原探[J].东南学术,2011(02):72-78.

旅游业发展以来,村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除了体现为上文提到的收入绝对数字的增长:村中人均收入由2000年的2200元,提升至2011年的5400元,至2015年的23000元,从负债状态、低于区平均水平提升至高于区平均水平;还体现为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从原本单一的农作物耕种收入转变为包括农家乐收入(吃喝)、民宿收入(住宿)、农产品经营收入(茭白自由采摘及贩售)、公共设施收入分红(门票、特色小吃作坊、游玩设施等)等在内的第三产业收入综合构成。

(3) 产业发展改变村民精神面貌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打破了乡村系统封闭孤立的状态,强化了村民与外界的交互。对村民而言,意味着上文提到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迅速向都市生活转变,以及精神生活的丰富。对游客而言,意味着打破其以往对“三农”的刻板印象:作为乡村旅游发展基石的农业,也不再是低附加值的第一产业,而是驱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核;产业得到充分发展的农村不再是“脏、乱、差”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并无高下之分的、与城市相迥异的人居形态;生活在此间的农民,也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形象,获得了合作社成员、民宿经营者等新的身份。^①

4.2.3 生活情境与生态情境互动

在本案例中,生活条件的改善进一步正面影响着生态治理水平。具体体现为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物质保障,以及生活水平提升激励着生态治理行为。

(1) 基础设施建设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物质保障

通过得益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中的一革命四行动,顶村村通过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村容村貌提升行动和农房整治行动,村居环境的净化程度有所提升。这些包括污水管铺设、污水处理设备建设以及公共厕所建设等在内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在便利村民生活,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感的同时,客观上也对防控污染起着作用。

(2) 生活水平提升激励着生态治理行为

乡村旅游发展以来,一方面,顶村村民认识到收入提升、生活水平提高与生

^①许增巍.三生视角下田园综合体的价值内涵及建设体系构建[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11):239-240.

态治理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收入的提升降低了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支付成本带来的效用损失,两者共同激励着村民更加积极地投身生态治理行为,生态治理绩效得以提升。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对乡村这一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治理行为进行诊断，是中国乡村治理学者所需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奥斯特罗姆所提出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对解释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变迁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①因此，本文尝试将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引入乡村治理研究领域，以期为案例村庄的治理实践提供一种多变量组合的系统解释，并验证这一研究工具在将乡村整体作为资源系统进行治理行为诊断方面的适用性。基于“三生”视角，通过运用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对案例村庄治理历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适用于中国乡村治理语境。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是一个跨学科的整体性分析工具，将其引入中国乡村“三生”治理研究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本文立足案例村庄发展实践利用框架进行识别并有效筛选出了可以合理解释乡村治理行为的核心变量，并根据我国乡村治理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框架中治理系统的二级变量。通过对框架进行适应性调整，实现了为我所用，为讲好中国乡村治理故事探索出新的理论工具；

(2) 影响乡村“三生”情境中治理行为的核心变量可能包括：资源系统中的基础设施与位置状态，资源单位系统中各单位间的互动情况，治理系统中的村组织与合作社的运行状况，使用者系统中的使用者人数和技术运用等。其中，治理系统中的村组织与合作社是本案例中最具活力的核心变量，对于不同行动情境中治理绩效的提升均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3) 乡村系统存在着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等不同行动情境，不同行动情境之间的治理行为存在着互相渗透和影响。①生态治理行为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一方面体现在通过环境保护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与场地，另一方面体现在通过自然资源开发为产业发展提供卖点与基石；②生产治理行为对生活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体现在旅居一体化推进生活基础设施完善，另一方面体现在产业发展带动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同时还体现在产业发展改变村民精神面貌；③生活水平的改善又反哺着生态治理绩效，具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物质保障，以

^①王亚华. 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理解中国古代的灌溉自主治理[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3(02): 178-191+196.

及生活水平提升激励着生态治理行为这两个方面得以体现。

5.2 展望

乡村治理是一个涉及诸多学科的综合交叉领域。本文仅尝试性以生产、生活以及生态为切入点展开探索,研究内容与深度只能触及到乡村治理整体性与复杂性的一角,对后续研究的展望主要有:

(1) 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是一个丰富而灵活的研究工具。受制于研究者自身水平,本文仅选取其中七个在案例中较为显著的核心变量进行诊断与分析,仅仅对案例村庄“三生”行动情境中的治理行为做出粗浅地描摹和笼统地分析。期望能在后续的研究持续丰富和发展这一框架工具,继续将案例村庄的故事进一步细化。

(2) 进一步完善研究设计

本文对厦门市同安区顶村村治理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切入点是生产、生活以及生态行动情境。由于定性研究手段的局限性,本文对“三生”行动情境中具体治理绩效的量化表征还存在数据支撑不足等问题,相关研究结论也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在下一步工作中,期望能收集更多数据资料,以量化研究方法对质性研究手段进行补充,将研究结果更为立体全面地进行呈现。

参考文献

- [1] Wilson,GA. 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and back again? Exploring the (un)changed natural and mental landscapes of European agricultur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 2001,X6(1): 77-102.
- [2]Van Huylenbroeck G, Durand G.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 New Paradigm for Europea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M]. UK: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3.
- [3]Krister Wiberg. Ecological villages, a European reality[J]. Renewable Energy,1998,15(1).
- [4]Wade R.Village Republics: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South India[M].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1994.
- [5]Ostrom E, 2009,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Science, Vol. 325,pp.419-422.
- [6] Baland J M.& Platteau J P.,1999,The Ambiguous Impact of Inequality on Local Resource Management[J]. World Development,Vol.27,No.5,pp.773-788.
- [7]Ruth S. Meinzen-Dick. Gender, property rights, and natural resources[J]. World Development,1997,25(8).
- [8]王艳飞, 刘彦随, 严斌, 等.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地理科学, 2016, 36(1):20-28.
- [9]陈业宏,朱培源.从韩国“新村运动”解锁乡村振兴新思路[J].人民论坛,2020(02):72-73.
- [10]胡月,田志宏.如何实现乡村的振兴?——基于美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经验借鉴[J].中国农村经济, 2019(03): 128-144.
- [11]陈磊,曲文俏.解读日本的造村运动[J].当代亚太,2006(06):29-35.
- [12][韩]韩道铉,田杨.韩国新村运动带动乡村振兴及经验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9(04): 20-27+156.
- [1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国外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C]. 2011 城市国际化论坛——全球化进程中的大都市治理(案例集) 2011.
- [14][日]今井幸彦.日本的过疏地带[M].日本:岩波书店,1968:26.
- [15][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 18 页.
- [16][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
- [17]张星强主编.广西国际税收研究会研究报告 2016[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12,第 25 页.
- [18]薛晓源,陈家刚.从生态启蒙到生态治理——当代西方生态理论对我们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04): 14-21.
- [19]王雨辰.论西方绿色思潮的生态文明观[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53(04):17-26.

- [20]张京祥,申明锐,赵晨.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国际城市规划,2014,29(05): 1-7.
- [21]刘祖云,刘传俊.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 2018 (05):2-13.
- [22]罗万纯.中国农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供给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农户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4(11): 65-72.
- [23]韩磊,王术坤,刘长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及地区比较——基于 2011~2017 年中国农村发展指数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9(07):2-20.
- [24]王磊.农村中老年未婚男性的生活境况与养老意愿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15(01): 84-92+96.
- [25]左冬梅,李树茁.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J].公共管理学报,2011,8(02):93-100+127.
- [26]黄炎忠,罗小锋,余威震,唐林.农村居民绿色生活方式参与及影响因素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 34(03):49-55.
- [27]王如松.从农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期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方法[J].中国农村观察, 2000(01): 2-8+80.
- [28]闵师,王晓兵,侯玲玲,黄季焜.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基于西南山区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9(04):94-110.
- [29]张香菊,张康旭,张红喜.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环境正义实现途径[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 40(11):297-302.
- [30] 韩磊,王术坤,刘长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及地区比较——基于 2011~2017 年中国农村发展指数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9(07):2-20.
- [31]宋莎莎.基于河南生态旅游现状调查分析的农村生态旅游法律保护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 38(04): 223-227.
- [32]岳花艳.河南省农村生态环境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06):149-153.
- [33]秦海波,李莉莉.国外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分析框架评介与比较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20(03): 160-171.
- [34]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04):637-650.
- [35]王岱,藺雪芹,司月芳,余建辉.县域特色产业形成和演化机理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 2013,32(07): 1113-1122.
- [36]李伯华,曾灿,窦银娣,刘沛林,陈驰.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顶村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05):677-687.
- [37]刘晓昀,辛贤,毛学峰.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 2003(01): 31-36+80.

- [38]谢申祥,刘生龙,李强.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8(05):112-131.
- [39]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在农村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中的作用[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1):1-13.
- [40]曾福生,蔡保忠.农村基础设施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J].农业经济问题, 2018(07):88-95.
- [41]钱文荣,应一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11):39-51.
- [42]邹蕴涵.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J].财经界(学术版), 2018(01):3-5.
- [43]曲玮,涂勤,牛叔文,胡苗.自然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检验——自然地理条件对农村贫困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02):21-34.
- [44]曲玮,涂勤,牛叔文.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J].甘肃社会科学, 2010(01):103-106.
- [45]王亚华.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理解中国古代的灌溉自主治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3(02):178-191+196.
- [46]杨慧莲,韩旭东,李艳,郑风田.“小、散、乱”的农村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基于贵州省六盘水市舍烹村案例[J].中国软科学,2018(11):148-162.
- [47][美]斯蒂芬·P·罗宾斯.于淼等译.管理学基础[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 [48]黄佳民,张照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角色[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04):188-195.
- [49]张晓山.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现状、问题与展望[J].求索,2016(07):4-11.
- [50]龚丽兰,郑永君.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J].中国农村观察,2019(06):59-76.
- [51]黄佳民,张照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角色[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04):188-195.
- [52]党国英.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现状与展望[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56(03):2-7.
- [53]董汉松,黄皎.新时代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分析——评《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耕地流转》[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08):208-225.
- [54]李谷成,李焯阳,周晓时.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孰因孰果?[J].中国农村经济, 2018(11):112-127.
- [55]高瑞,王亚华,陈春良.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26(02):84-92.
- [56]唐林,罗小锋,黄炎忠,余威震.劳动力流动抑制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吗? ——基于湖

- 北省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9(09):88-103.
- [57]陈诗.新媒体背景下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应用研究[J].农村经济,2019(09):110-115.
- [58]李博,方永恒,张小刚.突破推广瓶颈与技术约束:农业科技扶贫中贫困户的科技认知与减贫路径研究——基于全国12个省区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9(08):42-50.
- [59]谢申祥,刘生龙,李强.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8(05):112-131.
- [60]张挺,徐艳梅,李河新.乡村建设成效评价和指标内在影响机理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1):37-46.
- [61]王洁琼,孙泽厚.新型农业创业人才三维资本、创业环境与创业企业绩效[J].中国农村经济,2018(02):81-94.
- [62]申云,李京蓉.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角[J].调研世界,2020(01):42-50.
- [63]陶玉霞.中国当代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及其表达的异化[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6):54-59.
- [64]张挺,李闽榕,徐艳梅.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8,34(08):99-105.
- [65]陶玉霞.中国当代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及其表达的异化[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6):54-59.
- [66]何露,闵庆文,张丹.农业多功能性多维评价模型及其应用研究——以浙江省青田县为例[J].资源科学,2010,32(06):1057-1064.
- [67]范水生,朱朝枝.休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原探[J].东南学术,2011(02):72-78.
- [68]许增巍.三生视角下田园综合体的价值内涵及建设体系构建[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11):239-240.
- [69]闵师,王晓兵,侯玲玲,黄季焜.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基于西南山区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9(04):94-110.
- [70]王亚华.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理解中国古代的灌溉自主治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3(02):178-191-196.

致 谢

提笔匆匆。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漫长的寒假。我的同学们或许还在家中与亲人共享天伦，而我则将在二十分钟后踏出宿舍，汇入杭城早高峰的芸芸人海。从学生到社畜的转变，我用了二十余年去准备，直到今天，怀着的难明的心绪，为学生时代画上一个潦草的句点。

在厦门的三年是我人生中最安静的三年，这三年的回忆里充满风声、流云和月光。我感激厦门带给我的珍贵的生命体验，感激这些与自己相处的松弛时光。而论及学业，我却始终既无天赋又难说勤恳。三年间时常袭来的自我怀疑和挫败感，让我逐渐明白自己与学术确乎无缘，毕业论文的准备更可说是一种折磨。从选题到定稿，无数次在崩溃边缘试探。与初稿相比面目全非的定稿、终结在 16 的论文版本编号、反复焦虑到失眠的夜晚，都见证着我不知所谓的挣扎。

以此为背景，这篇论文得以艰难产出，无疑离不开父母和师友的关照。感谢我的导师周茜老师，在学术和生活上对我的指导和关照；感谢我的父母，始终支持和相信着毫无天赋、毫不可爱的我；感谢所有给予过我善意的同学和朋友，庆幸有我们的彼此搀扶和守望相助；感谢我自己。What does not kill me, makes me stronger.